

# 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 及时代价值

●王 勇

**摘要:**红岩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魅力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在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红岩精神;内涵;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庆这座英雄之城孕育的红岩精神,为今天的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德提供了成功典范。”“要运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不懈奋斗,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一、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1985年,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由此冠名并传扬开去。这标志着“红岩精神”作为理论概念正式提出。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南方局所进行的斗争密切相连。

(一)红岩精神的形成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央南方局所进行的特殊斗争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产生于1939年至194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紧在军事、政治、思想战线上联合反共的复杂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武汉沦陷后,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就担负起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南方局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红岩精神的形成与久经革命考验的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及其领导下的优秀党员群体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的孕育者既是党中央重要领导又有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优秀党员群体。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主要领导集体,他们的理想信念无比坚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他们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顾全大局、善于团结。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国统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吸引在党的周围。比如,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红色资本家”卢旭章、肖林、鲁自诚等,以及情报人员沈安娜夫妇、张露萍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重庆

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积极进行狱中斗争,坚贞不屈、临危不惧,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光大了红岩精神。

## 二、红岩精神的特色内涵

正是由于红岩精神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就决定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魅力的特点。概括地说,红岩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 (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中外震惊的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引向破裂的边缘。在凶险的形势下,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力量,发动政治进攻,最终赢得时局好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sup>[1]</sup>

### (二)“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

这种品格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在联系群众,融入社会时,时刻坚守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不被浊流所淹没,不惧“染缸”的侵蚀,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比如,为党筹集经费的地下经济工作者,“红色资本家”、广大华行负责人卢绪章。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初交给党组织的现钞100万美元,最后与华润公司合并时上交资金达200万美元。还有华益公司的创办人、共产党员肖林也是如此。肖林夫妇经营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宣告结束时,一次性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就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达1000多万美元。卢绪章、肖林他们长期“混迹”于国统区的“大污池”中,不为任何诱惑所动,理想信念坚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给了党组织,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对党无比忠诚。

### (三)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如,江竹筠、陈然、王朴、刘国志、许晓轩、黄显声等共产党人临难不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被捕后,特务对他施

用了各种酷刑,要他交出《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交代上级组织。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其他的一概不说。面对敌人酷刑,陈然威武不屈,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面对死亡毫不畏惧,至死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由于叛徒的出卖在重庆荣昌县被捕。家人两次拿重金赎他出去,敌人只要他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可以释放回家,不用登报公布。但刘国志说,要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他的哥哥跪在地上求他,他仍然坚定地摇头不让步。上刑场前,他慷慨激昂地说,“与其跪着求生,宁愿站着倒在黎明前的枪口下”“只要党还在,我就等于没有死”。红岩烈士不惧牺牲、慷慨就义,以热血诠释了信念的分量。

#### (四)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将国统区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抗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是红岩“和衷共济”精神的另类典范。张冲曾经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1932年张冲炮制的一起“伍豪启事”,污蔑周恩来等人脱离共产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声誉更是严重的伤害。但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以其人格魅力化敌为友,与张冲合作团结抗日。国民党当权派中蒋介石的嫡系势力,如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组、陈诚等,他们虽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但主张联共抗日,对中共比较友好。周恩来同他们都有密切交往,并尽力争取,对他们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

### 三、弘扬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红岩精神为扩大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建立坚强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完成好中共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在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方针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制定出“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很好地隐蔽在群众中,使得国民党特务“找不到捕捉的目标”,达到了保存党的力量的目的。而且广大共产党员在依托职业,深入社会的同时,使自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起血肉相依的紧密联系。与之同时,通过党员长期隐蔽于社会中,深入于群众中,而潜移默化地把许多国民党统治区青年争取过来,逐步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极大地扩大了党组织在国统区的群众基础。当年南方局所创造的这种群众工作的方式,那些蕴含于红岩精神之中的深厚的“群众观念”与“人民意识”,对于新时代的执政党,在做群众工作时,如何更好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有形于无形”,真正将“群众观念”变为执政中的自觉,无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红岩精神为新时代不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有益路径

当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神圣使命,在

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较量中,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促抗战,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相忍为国的坚韧毅力坚持重庆阵地。正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始终以“民族大义”来判断政治形势,调整斗争策略,才可能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大局直至抗战胜利。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还善于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即政治阵线)“画最大的圈子”,把团结争取一切爱国中间力量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并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坦荡人格,去与他们交朋友,尊重爱护、关心支持他们的利益和诉求,逐步与他们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成为党政治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最终与党一道共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境界,为新中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利益诉求之复杂前所未有的,就更需要弘扬“海纳百川”的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展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努力画出新时代最大最美同心圆。

#### (三)红岩精神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镜鉴

抗战时期,南方局始终把强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和个人政治修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周恩来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和制定的《我的修养要则》所展示的人格力量;董必武为六角钱向中央作检讨所体现的崇高的自律精神,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下,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普通党员都能自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自身的理想信念,加强个人的政治理论修养,从而才能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经受住金钱美色的诱惑,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历史证明,正是有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言传身教和榜样力量,使当年在红岩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能经受住各种诱惑与考验,永葆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样,那些被囚禁在歌乐山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用献血与生命总结出“狱中意见”,对党组织慎重提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sup>[2]</sup>等八条真知灼见。“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行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一步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红岩烈士们的谆谆嘱托转化为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 [参考文献]

- [1]周勇.论“红岩精神”[J].探索,2009(06).
- [2]陈全、徐术.顽强奋起迎接解放[J].红岩春秋,2006(11).
- [3]朱军.全面推进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弘扬[N].重庆日报,2019-9-20.
- [4]周勇.红岩精神研究[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 [5]崔健.红岩精神:革命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共铸及其在新时代的价值[J].探索,2019(03).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委党校,重庆 404100)